

贵州汽车银币铸地考

钱存浩



民国十七年（1928年）周西成任贵州省省长时期，为纪念省公路通车，铸造过面值一元的“汽车银币”（国际市场称为“AUTODALLOR”）。铸造总额为五万枚，铸工精细美观，银币成色高于周氏于民国十三年在黔北赤水仿四川“汉”版银币的56%，低于当时中央政府规定标准的12%左右。这种银币由于仅在贵州省境内流通，具有浓厚的乡土色彩，流通时间不长，流传后世的数量甚少，且系“纪念币”性质，颇受国际上钱币收藏家的关注与喜爱。目前国际钱币市场偶有发现，索价高昂，视同珍宝。

贵州银币正面上端铸“中华民国十七年”七个字，下端铸“壹圆”二字（大写），银币中心铸“贵州银币”四个字，对读；银币背面上端铸“贵州省政府造”，下端铸“七钱二分”字样，均由右至左识读，用正楷字体。这种银币的图案，花饰设计及书法字体与四川“汉”字版银元酷似，背面内圈为汽车停放在草地上的图形，草丛中隐现有“西成”草体字两个，亦自右至左书写，形成暗记。此事距今只有五十余年，不仅在历史文献资料中有记

载，很多地方人士，对周西成在贵阳南门外设厂铸币一事，记忆犹新。但是这个汽车银币的铸地问题，在国内外钱币研究专家、收藏家中，至今尚有争议。特别是英籍钱币专家E. KANN（耿爱德）对此提出独特的见解，在其专著《ILLUSTRATED CATALOG OF CHINESE

COINS》(中华钱币图说汇考)中说:在1939年以前,上海中央造币厂没有内迁贵州以前,贵州没有造币厂。还指出汽车银币的花饰图案设计与书法字体均与四川“汉”字银币相似,据以断定此币为成都造币厂铸品。耿氏自1929年即旅居上海,当外汇经纪人,也参加过外资汇丰银行工作,40年代受南京国民政府聘为钱币顾问,他收藏的中外钱币异常丰富,著述内容颇为渊博,因此他的见解在国际上影响至为深远。

我国钱币学专家施嘉干在1949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币制汇考》第14页对民国十七年周西成主黔铸“贵州银币”曾有记载,台湾学者张璜、张惠信等人著述中对“贵州汽车银币”的造型,也有描述,但均不能据以肯定或否定此币为贵州造币厂铸造。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肖梅博士,1938年编著的《贵州经济》中第15章第2节中说:“民国十五、六年周西成主持黔政,积极整理金融……乃于贵阳城外设造币厂铸造一元‘川洋’……。”她虽然肯定了当时在贵阳设有造币厂这一史实,但指出所铸为一元川洋,语气温含混令人难解。

近年,上海也有人对贵州为汽车银币铸地这一问题,表示异议,主要的论点是:

一、汽车银币铸工精美,周西成执政时期,贵州既无现代机械工业,不可能创办造币厂,铸造机制银币。

二、汽车银币与四川“汉”字版银币的花饰与设计以及书法字体的风格完全一致,不仅是同铸于一厂,且系出于同一设计师之手。

三、汽车银币与四川“汉”字版银币的成色均为88%,重量均为26.66克,二者规格一致。

他们断定这种举世瞩目的贵州汽车银币为四川成都造币厂铸品。由于我省国民党统治时期以前的历史档案,几经浩劫,损失殆尽,而周西成主黔时期,是一个独立王国,常常不受中央政府号令的约制,很多事情并未报经中央政府批准或备案,加以汽车银币的成色低,更不可能获得上级官方的批准;故在全国历史档案中,迄今尚未发现有关用周氏铸币以及有关贵州汽车银币铸地问题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可供依据,为考证这一问题带来困难。然而根据下列各项资料足以肯定,贵州汽车银币确为贵州造币厂铸品。

一、关于1939年抗战初期上海中央造币厂是否内迁贵州和在此以前贵州是否设立造币厂问题。

1.从1928年铸汽车银币到现在,只有五十八年的时间。现年七十岁的华村人同志(贵阳市政协委员,是民国初年财政司长华之鸿之孙,前商业厅副厅长华问渠之子),在出席省金融学会金融历史座谈会上明确的说:当贵州造币厂铸造汽车银币的时候,他已有十三岁,因造币厂与华氏经营的永丰纸厂设在●处,他的父亲华问渠当时担任永丰纸厂厂长,曾随父出入于造币厂,并目睹贵州汽车银币确系该厂所铸。

现年八十余岁的工商界知名人士赖贵山(时为赖兴隆钱庄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张笑尘(当时经营百货业)老先生,都能清楚地说明周西成当了省长以后,在贵阳南门外华家纸厂设立造币厂和韩原熙任厂长的史实。张老先生还说:这种汽车银元,在周西成死后(1929年)毛光翔主政时期,市上就已经绝迹了。

抗战初期上海中央造币厂是否内迁贵阳与探讨1928年贵州铸造银币问题,并不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不过是持否定论的国内外人士借此叙明贵州在1939年前由于荒凉与落后没有铸

币条件而已。但是很多人当年曾由沿海地区内迁贵阳，其中有些人胜利后回乡，有些人还留在贵州，他们都可以充当历史见证人。我自己是1938年从天津内调旧银行工作，1939年春以后留住贵州，我没有见到或听说上海中央造币厂内迁贵州这件事。

2. 有关历史文献的记述。国民党统治时期，曾任贵州省建设厅主任秘书多年的赵惠民先生生前在《贵州文史资料选辑》1979年第二辑第241页“贵州货币流通史话”一文中说：“周西成来到贵阳后，曾一度利用华家造纸厂作为贵州造币厂，造过一批汽车牌银元，数量不多，成色不足，……只是昙花一现。”曾任贵阳市工商联主委冯程南生前在《贵州文史资料选辑》1984年第15辑第192页“解放前贵州的货币与货币贬值”一文中说：1926年周西成统治贵州时，曾一度利用华家造纸厂机器，在重庆雇请造币技术工人来筑造银元，版面为一辆汽车，称为“汽车钱”，因材料——白银来源不足，……出品不多，……市面通行无阻。“冯氏与赵氏回忆录的内容，明确指出周西成在贵阳铸造汽车钱这件史实。

《贵州军阀史资料选辑》第144页“周省主席兼军长一年来之政绩”一文中说：“贵州省制异常紊乱，且劣币充斥市面，周省主席以币制关系社会金融至重且大，遂设立造币厂，购办机械，制造模型，开工鼓铸。”同一文中还说：在南门外设立兵工厂（与造币厂同一地址）招集各县枪工，将原有赤水、沿河、遵义等处造枪机器概行运省，并在上海、武汉、重庆等地添购机械，聘来高等技师，增加机器设备，提高技术水平，所造新枪、机关枪异常精利。民国十六年七月三十一日《贵州改进日报》（存贵阳市档案馆）新闻消息刊登：“造币厂奉省政府命令，并派专员赴镇远搬运锅炉、引擎、压榨机等重要机件，不日即可分批运省。”上述资料将周西成筹设贵州造币厂的时间、机器设备、技师来源以及当时的技术水平都作了较为全面的记载，使我们可以理解，尽管周西成主政时期贵州民用机械工业水平极为落后，但军事设备方面出于扩张军力的野心，很多机器设备是由国外订制经上海等地辗转内运，已经可以制造质量较高的机关枪。具备这种冶铸、压制工艺技术水平以后，铸造银币的困难也就迎刃而解了。

二、汽车银币与四川“汉”字版银币的成色问题。

据40年代起即在贵阳中央银行经手收兑银元工作，解放后仍留在中国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继续经办收兑工作的陈永元老同志谈称：民国十三年周西成驻扎黔北赤水时期，铸造过大量“赤水造银元”，市上称为“赤造”，共有两种版面。其一是仿中山纪念币，毛重25.63克；另一种是仿四川银币并在币面打钻一个“周”字，俗称“钻版”，毛重25克。上述两种赤造银元的成色均为50%，而汽车银币的成色则按79%收兑。1984年10月又经抽查了一枚汽车银币，经贵阳无线电一厂分析，实测结果肯定含银量为78.21%，低于当时中央政府规定铸造银币的标准88%（包括四川银币在内）。周西成当年铸造低劣银币，往往是收购银色较高的银锭及民国三年袁头进行改铸，谋取差额利润，增加财政收入，若要求成色达到88%，在当时的生产规模与机器设备条件下，必将增加成本，甚至无利可图，那就不符合周氏政权的需要，也就没有必要铸造银币了。

三、为什么贵州汽车银币与四川银币同一风格？

民国年代川、滇、黔三省地方军阀争战颇多，贵州部队每次出省入川作战，军费来源多临时就地向巨商富户派款，但如长期驻守一地，则必须另辟财源。《四川文史资料选辑》四辑傅友周所著“重庆铜元局的片断”一文第36页说：“黔军远涉川境，餉给较为困难，依赖

铜元局尤甚，对铜元局的争夺也很激烈，周西成就曾三占铜元局。”文中还说：“黔军主要靠收回制钱和小面值铜元改铸当二百铜元”。可见周西成进驻重庆自兼铜元局局长，不仅是为了便于掠夺仅有的库存铜元，而且是希望继续生产铜元供应军需。还有人说：周西成撤离重庆退守黔北赤水时期，曾将重庆铜元局的部份机器设备、技术工人带回赤水设立造币厂铸造“赤造银元”。因此，他于民国十五年做了省长以后没有效法前任滥发纸币的故技，而是吸取民国年代四川军阀在重庆、成都等地铸造劣质金属货币在防区内强制流通的经验，以及因接管重庆铜元局所形成的各种有利因素，设厂鼓铸劣质银元。采用这种手段欺骗群众，剥削人民，基本上成为周西成主政时期的货币管理方针。周西成接任一年，为纪念省公路通车，积极筹设贵州造币厂，前往四川延聘铸币专业技师，委托四川能工巧匠，设计就地铸造银元模具，带回贵阳利用军工设施，加工鼓铸汽车银元，以致形成汽车银元在外型设计及书法字体与四川“汉”字银元风格上的一致，甚至这两种银元的设计铸模均出于同一技师之手，也是完全可能的。

周西成去世后，这种土洋结合、军民协作的铸币方式并没有烟消云散，在毛光翔、王家烈主政时期，贵州修枪厂（周西成的兵工厂改称）如法铸造过“贵州当十银元”；谷正伦主政时期利用周氏造币厂遗留的机器，派遣贵州物产公司总经理朱迈昌前往广州添购机器，延聘铸币技师，并在广州委托设计竹枝银元与二十分银辅币钢模，带回贵阳使用；刘伯龙组成八十九军后，利用龙里修械厂设备，派遣少校参谋上海人顾炳炎前往四川活动，解决了刻制铸币模具的困难，不仅仿造了帆船版银元，还更多的仿造了利润更多的云南半开，投入市场流通。上述情况既有历史档案资料存查，也有“活资料”可以对证，说明贵州自民国十三年至民国三十八年（1924—1949年）这一历史时期内，虽无正规的现代第一流设备全盘机械化的造币厂组织机构，但能重金延聘四川、广东熟练铸币技师、高级雕刻模具的能手，充分利用军工技术设备，为贵州生产出如贵州汽车银元、竹枝银元、二十分银辅币等多种铸工精细的金属硬币。

中

幣 錢 圖 庫



1988

3

(总第22期)

CHINA NUMISMATICS

谈汽车银币的铸地

钱杰

民国十七年(1928)周西成主黔时发行的汽车银圆,当是周西成请四川成都造币厂代铸。理由如下:

一、西人耿爱德著《中国币图说汇考》,谈及中国银币版式达一千四百余种,如加上今天各种专著对银币版式的叙述,总数还要多。但汽车币正面中心花饰与四川军政府造的大汉银币(见本刊1985年第二期“民国时期四川通用硬币选”)完全相同,这在名目繁多的中国银币中是绝无仅有的。查对清代陈谟子编辑的《花镜》,并蒙郭若愚先生审核,确认这中心花饰是芙蓉花。我们知道成都又名蓉城。如果四川大汉银币以芙蓉花作中心花饰应是名副其实铸地标记,那么汽车币套用芙蓉花作中心花饰应是贵州汽车币请四川成都造币厂代铸时的暗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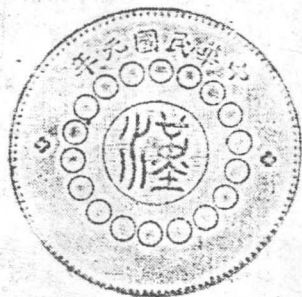
二、耿爱德系原中国财政部钱币顾问,又是收集中国银币大家,他的纪录应该是有根据的,现简译如下:

“贵州原无自己的造币厂,最早的贵州近代铸币设施要迟至1939年方见端倪,那是为了对日战争的需要,将原设上海的中央造币厂部分设备转移到此”。

汽车银币虽然鉴于日后滥制,成色不为世人称道(与四川大汉银币相仿),但制模工整精美,不可能由旧工场、炉房制成。若耿氏说法成立,1939年前贵州并无近代机器造币的设备,则1928年不可能在霎时创办造币厂,赶制批量汽车银币。

细审汽车币和四川大汉银币:二者边齿吻合,正面设计格局彼此酷肖;再从这二种银币上文字的遣词用语相似,书体笔意一致来看,在同时代银币中自成一格。因此推测:这二种银币不仅同铸于成都造币厂,甚至出于同一设计师之手。

三、四川大汉银币成色差异和版别繁多,使善分版别的收藏家也觉得没有意思。贵州汽车币虽铸额不多,但它的版式可见于字体不一,汽车各部分的刻画相异(如车轮大小、车轮上辐射线多寡、车窗构式不一、汽车前部直线有无圆点等等),草丛排列层次、粗细、多少不同。审查不严和粗制滥造,这些铸币工作上的共同缺陷,也构成四川大汉银币和贵州汽车币的自身固有的特点。



中國錢幣論文集

第 二 輯

A COLLECTION OF CHINESE
NUMISMATIC THESES

F822.773
2-4

目 录

序	戴志强	1
试论青海古代文化与原始货币的产生和发展	张永溪	9
先秦货币的若干问题	马飞海	23
论博山刀	李学勤	33
燕国货币的发现与研究	石永士 王素芳	38
三孔布为战国中山国货币考	汪庆正	69
三孔布考辨	张 弛	74
古币文三释	张 颌	85
“郢爰”产生、发展和消亡全过程的历史考察	黄德馨	89
秦半两钱文图说	[香港] 关汉亨	105
上林三官钱范“辰刊”二字考释	陈尊祥	118
澄城坡头西汉铸钱遗址之我见	吴镇烽	123
两汉五铢钱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吴荣曾	131
西汉五铢钱范断代研究	蒋若是	141
从出土钱范探讨西汉五铢的铸钱工艺	党顺民	153
马王堆汉墓“聂币”考	周世荣	173
新货古学论	朱 活	188.
再论汉佉二体钱	林梅村	194
武德钱文制词的考察	唐石父	205
闽开元铅钱的新发现及其铸主	蒋九如 刘敬扬	218
补说日本三大钱谱北宋钱	柴国宏	223
北宋威远监滔山(镇)监的设置和铁钱铸行的概况	马定祥	223
论宋徽宗时期的通货膨胀	陈悟年	233
现存最早的钱谱《货泉沿革》	俞兆鹏	246
——兼说“董通”《钱谱》	姚朔民	260
南宋各界会子的起讫、数额及会价	汪圣铎	270
会子的界分与数额	杜文玉 王克西	285
两宋时期四川地区铁钱铸行初探	贾杰三	290
南宋临安府钱牌研究	陈 浩	295

试论两宋的“称提”与“折阅”

——探讨两宋治理通货膨胀的途径

宋代铸钱工艺研究

草原丝路与契丹货币经济

金代“承安宝货”探索

新疆博乐发现的察合台汗国金币初步研究

明代江苏的铜钱流通及外流

略论清代前期南疆的普尔制

云南牌坊银錠

云南出土货币初探

从古代中外货币交流探讨广州海上丝绸之路

我国古代黄铜铸钱考略

贵州汽车银币铸地考

西藏“新一钱”铜币的版式

人民革命政权最早的银行及其货币

对井冈山根据地“工”字银元一些争论疑点的看法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货币政策

鲁西银行的建立、发展、沿革及鲁西银行币发行经过

浙东抗日根据地的金库兑换券

南方人民银行的建立及其历史作用

人民币反假和印钞技艺的特殊性质

探索钱币研究的新路子

藏币研究及其现实意义

我国钱币研究的新发展及其社会应用

后记

郭彦岗 309

华觉明 张宏礼 321

周锦章 田广林 332

王秀山 339

蒋其祥 李有松 345

汤可可 355

穆 渊 361

汤国彦 洪天福 370

王大道 375

王贵忱 王大文 385

周卫荣 394

钱存浩 401

王海燕 405

袁常奇 417

张 瀛 421

杨希天 雷和平 427

马宪玉 436

黄成 陈浩 442

吴平 陈忠 陈佩山

曾桂婵 肖茂盛 曾超仪 451

徐吉周 455

袁明祥 460

次仁平措 阎伦樟 朱进忠 (执笔) 464

张季琦 469

478

贵州汽车银币铸地考

The Minting Place of the Motor Dollar of Guizhou

钱存浩

Qian Cunhao

汽车银币是 1928 年周西成任贵州省长时期，为纪念贵阳——桐梓公路通车而铸造的，当时铸额不多，流通区域很小，流传至今的很少，在国际市场上很受注意。但长期以来，人们或不能肯定其铸地，或认为是由四川代铸。作者查阅了历史资料和当时人的回忆，证明周西成是利用了军工厂的设备和工人，延聘四川等地技师开设造币厂，来铸造汽车银币的。

The silver Motor-Dollar was minted in 1928 at the time when Zhou Xicheng was the governor of Guizhou province to commemorate the opening to traffic of the high way from Guiyang to Tongzi. The mintage at that time was very small and the circulating area very limited and up to now there are not many left, so it is very popular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But in a long time, people either can not confirm the place of minting or think that it was minted in Sichuan. After checking with historical material and the recall of the persons concerned, the author proved that the dollar was minted by the facilities and workers of a military plant utilized by Zhou Xicheng and the technicians were engaged from Sichuan and other places.

民

国 17 年 (1928 年) 周西成任贵州省省长时期, 为纪念贵阳——桐梓公路通车, 铸造面值一元的“汽车银币” (国际市场称为“AUTO DOLLAR”)。铸造总额为 5 万枚, 铸工精细美观, 银元成色高于周氏于民国 13 年在黔北赤水所铸仿四川“汉”版银币及“帆船”银币, 低于当时中央政府规定标准。由于这种银币仅在贵州省境内流通, 具有浓厚的乡土色彩。流通时间不长, 流传后世的数量甚少。且系“纪念币”性质。颇受国际上钱币收藏家的关注与喜爱。目前国际钱币市场偶有发现, 索价高昂, 视同珍宝。

银币正面上端铸“中华民国十七年”七字, 下端铸“壹圆”二字, 银币中心铸“贵州银元”四字, 对读, 银币背面上端铸“贵州省政府造”, 下端铸“七钱二分”字样。均由右至左读, 用正楷字体。内圈为草地上的汽车, 草丛暗隐“西成”二字。贵州银币的图案, 花饰及书法字体, 与四川“汉”字版银元近似。

此事距今六十年来, 不仅在历史文献资料中有记载, 很多地方人士, 对周西成在贵阳南门外设厂铸币一事, 亦记忆犹新。但在国内外钱币研究家和收藏家中, 对这个汽车银币的铸地问题, 至今尚有争议。特别是英籍钱币专家 E.KANN (耿爱德) 对此提出了独特的见解。耿氏在其专著《ILLUSTRATED CATALOG OF CHINESE COINS》(《中华钱币图说汇考》) 中说: 在 1939 年上海中央造币厂设有内迁贵州以前, 贵州没有造币厂。还指出汽车银元的花饰图案设计与书法字体, 均与四川“汉”字银币相似, 并据以断定此币为成都造币厂铸品。耿氏自 1929 年即旅居上海, 当外汇经纪人, 也参加过英商汇丰银行工作, 40 年代被南京国民政府聘为钱币顾问。他收藏的中外钱币异常丰富, 钱币方面学识颇为渊博, 因此他的见解在国际上的影响非常深远。

我国钱币学专家施嘉干著《中国近代币制汇考》(1949 年出版) 对国民 17 年周西成主黔铸“贵州银币”曾有记载; 台湾学者张璜、张惠信等人的著述中, 对“贵州汽车银币”的造型, 也有描述, 但均不能据以肯定或否定此币为贵州造币厂铸造。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肖梅博士, 1938 年编著的《贵州经济》(第 15 章第 2 节) 载: “民国十五、六年间周西成主持黔政, 积极整理金融……乃于贵阳城外设造币厂铸造一元‘川洋’”。虽肯定了当时在贵阳设有造币厂这一史实, 但说所铸为一元“川洋”, 而非汽车银币。

近年, 上海也有人继续探讨贵州汽车银币铸地问题, 其主要之点有: (1) 汽车银币铸工精美, 周西成执政时期, 贵州尚无现代机械工业, 不可能创办造币厂, 铸造机制银币。(2) 汽车银币与四川“汉”字版银币的花饰与设计以及书法字体的风格完全一致, 不仅是同铸于一厂, 且系出于同一设计师之手。(3) 汽车银币与四川“汉”字版银币的成色均为 88%, 重量均为 26.25 克, 二者规格一致。因此, 他们断定贵州汽车银币为四川成都造币厂铸品。

我省在国民党统治前的历史档案, 因军阀混战, 几经浩劫, 损失殆尽。而周西成主黔时期, 贵州是一个独立王国, 常不受中央政府号令约束, 很多事情亦未报经中央政府批准或备案。且汽车银币成色低, 难于获得官方批准。因此在全国历史档案中, 迄今尚未发现有关周氏铸贵州汽车银币及铸地问题的第一手历史档案资料, 为考证这一问题带来了困难。但根据我们已搜集到的资料, 仍可以肯定贵州汽车银币确为贵州造币厂的铸品。

一、历史文献及见证人的回忆。国民党统治时期, 曾任贵州省建设厅主任秘书多年的赵惠民先生, 生前在《贵州文史资料选辑》1979 年第二辑第 241 页《贵州货币流通史话》一文中说: “周西成来到贵阳后, 曾一度利用华家造纸厂作为贵州造币厂, 造过一批汽车牌银元, 数量不多, 成色不足……只是昙花一现”。曾任贵阳市工商联主任委员的冯程南先生,

生前在《贵州文史资料选辑》1984年第15辑第192页《解放前贵州的货币与货币贬值》一文中说：“1926年周西成统治贵州时，曾一度利用华家造纸厂机器，在重庆雇请造币技术工人来铸造银元，版面为一辆汽车，称为‘汽车钱’，因材料——白银来源不足……出品不多……市面通行无阻”。冯氏与赵氏回忆录的内容，明确指出周西成由重庆请来技师在贵阳铸造“汽车钱”。

《贵州军阀史资料选辑》第144页《周省主席兼军长一年来之政绩》一文中说：“贵州省制异常紊乱，且劣币充斥市面，周省主席以币制关系社会全融至重且大，遂设立造币厂，购办机械，制造模型，开工鼓铸”。“在南门外设立兵工厂（与造币厂同一地址）招集各县枪工，将原有赤水、沿河、遵义等处造枪机器概行运省，益在上海、武汉、重庆等地添购机械。聘来高等技师。增加机器设备，提高技术水平，所造新枪、机关枪异常精利”。民国16年7月31日《贵州改进日报》（存贵阳市档案馆）新闻消息刊登：“造币厂奉省政府命令，业派专员赴镇远搬运锅炉、引擎、压榨机等重要机件，不日即可分批运省”。上述资料将周西成筹设贵州造币厂的时间，机器设备、技师从何处来，以及当时的技术水平等，都作了较为全面的记载。可见，尽管周西成主黔政时期，贵州民用机械工业水平极为落后，但军事设备方面出于扩张军力的野心，拥有的设备已能制造机关枪。具备这样工艺技术水平，铸造银币的技术问题就不难解决。

从1928年铸汽车银币，距今才六十年来。据华树人先生（贵阳市政协委员，清末贵州官钱局总办华之鸿之孙，前商业厅副厅长华向渠之子）1986年出席省金融历史座谈会回忆说：贵州造币厂铸造汽车银币的时候，我已有13岁。因造币厂与华氏经营的永丰纸厂设在一处，家父当时担任永丰纸厂厂长，曾随父出入于造币厂，目睹贵州汽车银币确系该厂所铸。又据现年80余岁的工商界知名人士赖贵山（时为赖兴隆钱庄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张笑尘（时经营百货业）等老先生的回忆，也清楚地说明：周西成当省长以后，在贵阳南门外华家纸厂设立造币厂，并委韩原熙任造币厂厂长。张老先生还说：这种汽车银元在周西成死后（1929年）毛光翔当政时期，市上就已绝迹了。

二、汽车银币与四川“汉”字版银币的成色问题。据40年代起即在贵阳中央银行经手收兑银元工作，解放后仍留在中国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经办收兑金银工作的陈永元同志回忆：民国13年周西成驻扎黔北赤水时期，铸造过大量“赤水造银元”，市上称为“赤造”，共有两种版面。其一是仿中山纪念币，毛重25.63克；另一种是仿四川银元并在币面打钻一个“周”字，俗称“钻版”，毛重25克。上述两种赤造银元的成色均为50%，而汽车银币的成色则按79%收兑。1984年10月又经抽查了一枚汽车银币，经贵阳无线电一厂分析，实测结果肯定含银量为78.214%。低于当时中央政府规定铸造银币含量88%的标准（包括四川银元在内）。由于周西成当年铸造的低劣银币，往往是收购成色较高的银锭及民国3年袁大头改铸，谋取差额利润，增加财政收入。如若要求成色达到88%，在当时的生产规模与机器设备条件下，必将增加生产成本，甚至无利可图，那就不符合周西成政权的需要，也就没有必要铸造银币了。

三、贵州汽车银币与四川银币何以同一风格？民国年代，川、滇、黔三省地方军阀争战颇多。贵州部队每次出省入川作战，军费来源多靠就地向巨商富户派款。但如长期驻守一地，则必须另辟财源。《四川文史资料选辑》四辑傅友周所著《重庆铜元局的片断》一文第36页说：“黔军远涉川境，饷给较为困难，依赖铜元局尤甚，对铜元局的争夺也很激烈，周

西成就曾三占铜元局”。文中还说：“黔军主要靠收回制钱和小面值铜元改铸当二百铜元”。可见周西成进驻重庆自兼铜元局局长，不仅为了掠夺仅有的库存铜元，而且希望继续生产铜元供应军需。还有人说：周西成撤离重庆退守黔北赤水时期，曾将重庆铜元局的部分机器设备、技术工人带回赤水设立造币厂，铸造“赤造银元”。因此，他于民国 15 年任省长以后，没有效法前任滥发纸币故伎，而取民国年代四川军阀在重庆、成都等地铸造劣质金属货币，在防区内强制流通之策，而利用接管重庆铜元局这一有利因素，设厂鼓铸劣质银币，来解决财政问题。当周西成主黔政一年时，为纪念省公路通车，便积极筹设贵州造币厂，除充分利用原由重庆铜元局带来的技术工人外，并前往四川延聘铸币专业技师铸造银币模具，利用军工设施加工鼓铸汽车银币。以致汽车银币在外型设计及书法字体与四川“汉”字银币风格上的近似，甚至这两种银币的设计铸模均出于同一技师之手，也不是没有可能。

周西成去世后，这种土洋结合、军民协作的铸币方式，并没烟消云散。在毛光翔、王家烈主政时期，贵州修枪厂（周西成的兵工厂改称）也如法铸造过“贵州当十铸币”；谷正伦主政时期利用周氏造币厂遗留的机器，派遣贵州物产公司总经理朱迈昌前往广州添购机器，延聘铸币技师，并在广州委托设计竹枝银元与“黔”字二十分银辅币钢模，带回贵阳使用；刘伯龙组成八十九军后利用龙里修械厂设备，派遣少校参谋上海人顾炳炎前往四川活动，解决了刻制铸币模具的困难，不仅仿造了帆船版银元，还大量地仿造了利润更高的云南半开，投入市场流通。

上述资料既有历史档案资料存查，也有“活资料”可以佐证，说明贵州自民国 13 年至民国 38 年（1924—1949 年）这一历史时期内，虽无正规的机械化程度较高的造币厂，但能重金延聘四川、广东熟练铸币技师、高级雕刻师，充分利用军工技术设备，为贵州生产出如贵州汽车银币、竹枝银元、二十分银辅币等多种铸工精细的金属硬币。

后 记

在《中国钱币论文集》出版五年之际，我们编辑了《中国钱币论文集》第二辑，从一个侧面反映近年来中国钱币学界的新进展、新收获；亦是将这一阶段钱币研究各领域的精粹之作收集起来，展示于读者面前。

本论文集文章的选定采取各地推荐与集中编选相结合的原则，以拓宽选文的来源。编选中坚持以学术性、资料性作为衡量文章的标准。入选之作大多未曾发表过，少数则是已发表于各刊，而质量较高，价值较大的作品。

纵观本论文集，较之上一集，可感到作者队伍扩大了，一批中青年研究者渐趋成熟；论题范围扩展了，一些新领域正在被开拓，一些旧领域的研究正在深入，古为今用的问题正在逐渐得到重视。

参与本书编辑和工作的有：戴志强、张季琦、姚朔民、金德平、马力平、张武一、童子玉、王安、于放、焦秀云、苏建东。

在本论文集的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中国人民银行领导的热情关怀，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钱币学会理事长童赠银特为本书题写了书名，各地钱币学会、中国金融出版社、水电出版社印刷厂也给予了许多具体帮助。在此我们谨致以深切的谢意。

限于水平，在编选中一定有疏漏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